

論蘇俄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

畢英賢

國家有安全的目的。然而，任一國家的絕對安全自然而然威脅着另一國的安全。所以，講求國家安全很難從單一國家的利益出發，必須彼此兼顧，因此在近代國際政治中產生了「集體安全」的概念。

所謂集體安全，就是藉聯合行動抵禦侵略、確保相互協議各國之安全的一項政策。也是一項國際原則，按此原則，任一國家破壞和平，即破壞全體之和平；而對任一國家之侵略行為，即對全體之侵略。其他各國有權和有責任援助受害國家並抑止侵略國家之侵略（註一）。

就「集體安全」這一單純的概念來說，它是有利無害的。可是事實上，在強國與弱國共同組織安全體系時，就免不了形成一個以強國為中心的集團，以致「集體安全」等於「勢力範圍」。

蘇俄自從一九六七年起開始積極宣傳召開「歐洲安全會議」，建立「歐洲安全」。如今，歐洲安全會議籌備會將於年底召開，正式會議或將明年年初舉行。不論這個會議將來能否產生有利於世界和平的積極效果，是否能擬制具體的方案以確保歐洲安全，蘇俄在宣傳和積極的活動中業已收到對自己有利的效果。如果「歐洲安全會議」有所成就，蘇俄豈不成了「和平的主導力量」！

「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乃是「歐洲安全體系」的複印品。但是，由於亞洲與歐洲情形迥異，加上匪俄爭執未已，這個所謂集體安全體系的形成將更加困難，其性質將更加複雜。爰就這一設想的原委與動向析述於後。

※ ※ ※

蘇俄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不是突然產生的構想，而是多年來的一貫主意，祇是在從前實現此一構想的條件比現在更不利。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

，當東南亞公約組織召集會議時，蘇俄塔斯社宣稱，蘇俄相信「應該使國際情況在實質上健康起來，在各國間建立不可缺少的信賴，其途徑就是在歐洲與亞洲建立集體安全體系，以取代軍事集團」。顯而易見，蘇俄提出這個構想的原始與最終目的是對付自由世界的軍事聯盟。

十多年之後，一九六九年六月，俄共頭子布里茲涅夫在「共產黨與工人黨國際會議」上說：「現時的國際上的迫切問題不妨礙我們從事一個較長期的任務，那就是：在密佈着爆發新的世界大戰與發生軍事衝突威脅的地區內建立集體安全體系。這是現在軍事政治集團的最佳的替身。」同時，他強調：「我們認為事態的進程也把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任務提到日程表上來了（註二）！」可見，建立集體安全體系是世界共黨所標榜的「較長期的任務」。

在布里茲涅夫的冗長的講詞中關於「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祇用了這一句話帶過。看起來，這個觀念是偶然產生的。事實不然，共產黨人講話素來字斟句酌的。而且，在布某講此話之前不久，「消息報」評論員馬特維埃夫（V. Matveev）以「飽和了的真空」為題，論述亞洲的局勢，為他的論點鋪了路。文章特別說，從北平的報章的內容來判斷，毛澤東及其嚆嚨們支持西方所持的美英等撤離亞洲形成亞洲「真空」的論調，一定有所圖謀。中共自謂，從未派一個士兵駐於別國領土上。但是，馬特維埃夫說，在很多亞洲國家中，有些中國的僑民被毛派利用追求與當地主權毫無共同之處的目的。亞洲的獨立國家在消除外國軍事基地後已獲得了建立集體安全的先決條件。所以，這些國家應「共同努力鞏固和平，反擊任何帝國主義與擴張主義陰謀」（註三）。此處，馬某直率地把中共與「帝國主義」並列為「集體安全」的假設

敵。

自從布里茲涅夫提出這個觀點後，具體方案與原則並未立即形成，這也許由於亞洲的情勢依然處於劇烈的變化過程中，俄共尚無法把握這個變化的方向。因此，在俄共第廿四次代表大會上，布某在列陳俄共在國際關係鬥爭中的具體任務時，祇提到「盡一切努力以求得歐洲的集體安全」，而對「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未能有所交代（註四）。直到今年三月布里茲涅夫在蘇俄工聯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才把這個構想用較具體的語言提出。他認為，「亞洲集體安全」必須建立在這些原則上，那就是：「在國家關係中不採用武力、尊重主權、國界不可侵犯、不干涉他國內政、在完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廣泛發展經濟合作與其他合作」。他說，蘇俄不但現在支持，而且將來也支持這種「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註五）。

這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構想被布里茲涅夫拋出之後，不但中共喉舌，而且西方國家報紙認定它是為對付或包圍中共而設計的。對此，俄共宣傳則謂：「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不可能不包括全亞洲」（註六）；當然，不排除中共在外。此外，「真理報」的政治評論員馬耶夫斯基強調說，蘇俄提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構想，並不為自己要求任何特權、不爭取任何優越地位；不反對任何政府（註七）。俄共在世界面前所提出的這種自詡公正的說法很難使人因此釋疑。

我們從旁冷眼觀察，俄人的設計不外爲了下列三點目標：

——排斥毛共在亞洲的影響力；

——拉攏不結盟、中立國家，分化並爭取自由國家，排斥美國在亞洲的力量；

——然後，在亞洲建立起一個受蘇俄支配和以蘇俄武力為後盾的安全體系。

可以理解，對這構想所發出的最嚴厲的攻擊是來自中共以及其追隨者。

※ ※ ※

中共宣傳不僅把蘇俄所提出的「集體安全」視為是對中共的威脅，而且也是對全「亞洲人民」的威脅。例如，匪「人民日報」說：「蘇修的所謂『集體安全』，實際上就是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安全』，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者的『安全』……這所謂『集體安全』正是對於亞洲人民的威脅（註八）。」

此外，毛派把布里茲涅夫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比作杜勒斯的「軍事集團條約」，認為它是「侵略、干涉、欺負亞洲國家和人民的工具」（註九）。

俄共在宣傳集體安全體系時，同時高唱「區域經濟合作」口號。毛共對這個口號的解說：「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在推銷它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黑貨時，竭力給它蒙上一層誘人的包裝，這就是所謂亞洲『區域經濟合作』……其目的是為了拼湊反華軍事包圍圈（註十）。」

我們再看看毛共在歐洲的應聲蟲所作的批評。阿爾巴尼亞「團結報」說，「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實際上祇不過是「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火力包圍中國的陰謀變種而已」。同時該報指出，「克宮新沙皇」在這個陰謀運用中特別注意同遠東三個國家——日本、印度、印尼三個政府加緊勾結（註十一）。例如，為日本敞開西伯利亞大門，給予印度大量援助，與蘇哈托進行「勾結」。

在亞洲當時與毛共一個鼻孔出氣的有巴基斯坦，例如「巴基斯坦時報」曾發表文章說，「蘇修」提出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其目的是為了包圍中國」。

俄共方面，對毛共的攻擊並非充耳不聞，而經常作出反駁。指責毛派附和西方別具用心的「邪惡圖謀」的說法，曲解蘇俄的構想。其實，中共從一九五五——六〇年間，「不止一次建議，在亞洲與太平洋區域內各國間訂結包括美國在內的和平公約……而現在毛派霸權主義的野心使他們走上反亞洲、反人民的利益的道路」（註十二）。遠在一九五七年元月十八日匪俄簽署「蘇中聯合聲明」，曾提到：「雙方認為，所有排他性的軍事集團應該以集體和平與集體安全體系代替」（註十三）。

至於亞洲其他國家，偽蒙表現出最露骨的贊成，印度被毛匪指責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馬前卒」。那時，日本佐藤曾在國會表示，他在考慮建立亞洲安全體系的可能性；其他表示考慮此一構想的尚有阿富汗、新加坡等。一九七〇年三月間印尼外長馬立克曾訪問蘇俄，回國時曾謂，印尼「曾拒絕蘇聯的建議組織亞洲地區的集體安全體系」。

儘管蘇俄宣稱，這一構想不是為了反對任何一個亞洲國家，但是，布里茲涅夫提出這個構想的時間是在匪俄邊界武裝衝突之後，地點是在原設計為鬥爭毛匪而召開的世共大會上。這樣一來，使旁人很容易把「亞洲集體安全

體系」與匪俄衝突聯在一起。顯明的事實是，毛共一面對此大事抨擊，一面在國際舞台上由「紅衛兵式」的外交轉變變成笑臉外交了。

※ ※ ※

關於「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蘇俄並不是說說就算，它已展開，而且繼續在推動實際活動。一九六九年六月緊接着布列茲涅夫公佈這個構想之後，蘇俄政府把駐在印度、日本、巴基斯坦、泰國、高棉、尼泊爾、錫蘭、馬來西亞、寮國、中共、澳洲及美國的蘇俄大使同時召回。他們回國以後，討論些什麼重大問題外人不得而知，按照世界輿論的看法，此舉與推行「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構想或多或少有連帶關係。

近年來，蘇俄在亞洲的外交活動有了不少的成就。

首先是爭取印度的成功。在對付中共問題上，新德里的外交官員把蘇俄稱之為「天然的盟邦」。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雙方簽訂了「和平、友好與合作條約」，因此去年底印度大膽進兵巴基斯坦並贏得了勝利，成立了孟加拉國。目前，印度軍隊不斷獲得蘇俄的精良武器；而印度的港口也變成了越來越多出現在印度洋上的蘇俄船艦的停泊港。

關於孟加拉，蘇俄因為曾經支持其獨立現在正在收穫宣傳上的果實。蘇俄在達卡(Dacca)政治圈內極有份量的左翼學生團體內擁有相當的影響力量。

在處理巴基斯坦問題上，蘇俄極為謹慎。新總統布托上台後不久，就被邀到莫斯科去訪問，並恢復了對西巴的援助。

在中南半島上，由於北越所使用的精良攻擊武器皆是蘇俄供給的，因此一般相信蘇俄對北越的影響力較中共大。形成這個情勢的尚有一個心理因素，那就是，中南半島人民認為，蘇俄希望在中南半島成立一個以河內為中心的聯邦的國家，而中共祇希望在其邊界上存在着又小又弱的國家。

蘇俄與泰國之間的貿易額業已增加，不久前泰國國際航空公司開闢了從曼谷經塔什干、莫斯科到達斯德可爾摩的航線。據分析，由於美國有退出亞洲趨向，泰國逐漸感到中共的威脅。所以，泰國可能會進一步接近蘇俄。

菲律賓一向與共產國家不相往來，近來已改變態度。最近，曾派高級代表團訪問北平與莫斯科。但是，因為菲律賓與我國政府有友好關係，因此非與蘇俄接近可能較大。

在去年夏天的「尼克森震撼」之後，日本的外交漸趨獨立，蘇俄乘機拉攏。俄人表示，願意以交還部分北方島嶼為條件與日本簽訂友好條約。目前雙方正在討論開採西伯利亞石油與天然瓦斯合作問題。因此，日俄從經濟的合作轉而至於政治的接近是極有可能之事。

蘇俄一直聲言其領土的三分之二在亞洲，蘇俄也是一個亞洲國家，因此對亞洲事務的「關心」程度也日甚一日。可以這樣說，「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企圖之一就是爭取它在亞洲的主導地位。目前，蘇俄在亞洲加緊外交活動尤有促進「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實現的作用。

※ ※ ※

蘇俄搞歐洲安全會議已六年多，至今才籌備召開籌備會談，其成就尚為未定數。「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剛剛起步，很難有後來居上的可能。然而，俄共的宣傳却樂觀地預測，在「我們這一代」，它有實現的可能。其所持理由，「首先，蘇聯與社會主義國家在亞洲事務中的地位已經提高了」，能夠協助「進步力量從事帝國主義和反動力量的鬥爭」；其次，亞洲獨立國家的聲望與影響力的提高……有能力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註十四)。最近，「真理報」的政治評論員以「亞洲集體安全是一個已成熟的問題」為題發表論文，然而並未能舉出具體的、有利於實現這一構想的現存條件(註十五)。

蘇俄自稱也是亞洲國家，所以倡議「亞洲集體安全體系」。

美國也是太平洋國家，同時在亞洲很多國家內有承諾，因此，美國的態度必然發生一定的作用。一九六七年七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說：「集體安全制度是亞洲國家應該努力發展，而美國應予支持的一件事(註十六)。」看來，美俄對此一問題似乎意見相同。其實，美國的「集體安全」與蘇俄的「集體安全」在定義上有很大差別，不然，憑兩國的影響力，此事決不會遲遲沒有重大進展，而且在今年美俄高層會談的公報中也未提及此一構想。

也有一些美國輿論以為，蘇俄的「亞洲集體安全構想」並不直接反對美國。他們的想法是，俄國外交官員瞭解，亞洲非共產國家中，很少有國家願意接受沒有美國參加的集體安全安排(註十七)。這種論調顯然出自對蘇俄的不瞭解，素不知蘇俄亞洲安全中所擬的假想敵就是帝國主義與擴張主義。馬耶夫斯基在今年六月廿一日的「真理報」上清楚地指出，「在一條道路上，目

前主要的障礙乃是美國對中南半島人民的侵略。在現時的條件下，亞洲爭取安全的鬥爭與終止美國侵略、調整越南問題的鬥爭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他還強調說，「重大的反動力量乃是來自美國、英國以及亞洲個別國家中的大國沙文主義及軍國主義集團」。

在蘇俄現今的宣傳中，「大國沙文主義」在習慣上是指毛共。在另一段文字中則直率地指着毛共的鼻子說，「在集體安全的基礎上爭取亞洲和平與安全的鬥爭中，由於現今北平領導的立場，遭遇了新的困難。他們採取依靠武力的大國沙文政策……不願他們曾經與印度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存五原則。」俄共認為，毛派的分裂活恰好對「帝國主義政策有利，使亞洲的侵略勢力和擴張主義力量相接近」。

※ ※ ※

在我們的時代裏，由於核子武器毀滅性的殺傷力與投送系統的精確有效，核子大國間一旦發生戰爭，不僅會毀滅對方，也會毀滅自己。在此情形下，俄共首先高彈「和平共存」，接着美國尼克森總統也和以「談判的時代」。這裏，且撇開美國的政策目標不論，祇剖視一下俄國的「和平共存」的內涵就可知道，「和平共存」乃是俄共執行世界革命的手段，絕非它的目標。世人早已洞悉其詐，此處不必贅論。那麼，「歐洲安全會議」與「亞洲集體安全體系」顯然就是「和平共存」策略指向東西兩方的兩個箭頭。因此，「集體安全」也者也不是俄共的真正目標。

在此之前，自稱也是亞洲國家的蘇俄除在西伯利亞外少有立足之點。自從英國撤離蘇彝士以東，美國影響力逐漸降低，共匪在文革期間內內部不穩，外交孤立，蘇俄乘時而起，着手在亞洲爭奪勢力範圍。它打出的旗子是「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並含有動聽的原則。而用以促成這個構想的憑藉是：亞洲國家畏懼中共的心理、對殖民主義的宿怨以及區域經濟合作等。活動方式則是從修好個別雙邊關係着手。

前文已提過蘇俄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目標。此處祇補充一點，這一體系的基本原則之一是「國界不可侵犯」。人們知道，蘇俄不僅與中國有大批領土糾紛，而且同日本亦有了的領土問題。這裏也可看出蘇俄的心意。

客觀地說，這個構想實現的公算實在不大。在亞洲，各國間依然存着不

易調和的利益衝突，如孟巴衝突、匪印衝突、匪俄衝突等。其次，各國之間很難建立相互的信心。就蘇俄本身來說，亞洲的禍患多半由於共黨的作亂。蘇俄仍然是共黨強國，因此亞洲國家很難安心與它共處。至於「區域經濟合作」也令人提不起興趣。莫斯科能提供些什麼呢？此外，俄國會不會像美國那麼慷慨？俄援一向是從「生意」着想的，有印尼為證，它至今尚欠蘇俄八億多美元的軍火賬。也許，世界情勢會變，亞洲情勢會變，俄國情勢會變，有一天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條件會成熟。不過，那該是不可知的、遙遠的未來。

註一：「王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四冊第一八六頁

註二：俄「消息報」，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

註三：「消息報」，一九六九年五月廿九日

註四：參閱「共產黨人」一九七一年三月號

註五：「消息報」，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一日

註六：V·帕夫勞夫斯基，「國際生活」，一九七二年六月號，第三

五頁

註七：馬耶夫斯基，「真理報」，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一日

註八：匪「人民日報」，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日

註九、十：匪「人民日報」，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

註十一：阿爾巴尼亞「團結報」，一九六九年八月卅一日；匪「新華社

「九月一日廣播

註十二：同註六，第卅頁

註十三：「一九一七——一九五七年蘇中關係」（俄文版），「遠東文

獻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第三百三十三頁

註十四：「國際生活」，一九七二年，第六期，第卅一頁

註十五：同註七

註十六：「美國新聞處關島廿五日電」，「中央日報」，一九六九年七

月廿七日

註十七：例如，一九六九年七月五日「洛杉磯時報」